



[英] 彼得·弗莱明 著  
侯 萍 宋苏晨 译

One's Company

# 独行中国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

南京出版社

[英] 彼得·弗莱明 著  
侯 萍 宋苏晨 译  
宋文伟 审 校

# 独行中国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

*One's Company*

南京出版社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Peter Fleming 1934, 200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行中国 1933 年的中国之行/[英]彼得·弗莱明著;  
侯萍,宋苏晨译.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张子清主编)

ISBN 7-80718-115-1

I. 独... II. ①弗... ②侯... ③宋... III. 游记  
中国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038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111

丛 书 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书 名:独行中国 1933 年的中国之行

作 者:彼得·弗莱明

主 编:张子清

译 者:侯萍,宋苏晨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17(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mailto: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赵育春

装帧设计:侯亚洲,郭春明

印 刷: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965×1270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215 千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718-115-1 K·26

定 价:18.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丛 书 导 言

张子清

从前,中国人总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天下的中心,自己的朝代是了不起的朝代,什么大唐、大宋、大明或大清等称呼,叫得挺响亮,听起来也挺舒服。远的不说,单说清朝末年,尽管它已经处于腐朽没落之际,皇帝及其大臣们仍然歌舞升平,陶醉在“我大清王朝”的“繁华”里,这正是 19 世纪中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上升时期。西方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这套“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的作者各自从西方人的角度,记录了他(她)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运用引人入胜的游记、日记或书信的艺术形式写就的作品“在欧洲和北美很畅销”,因此对“塑造和培养”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sup>①</sup>换言之,他(她)们的某些偏见自然使没有机会来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形成错误的印象,同时他(她)们的见证和良知也很有说服力地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偏见。

---

① Elisabeth Croll, *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 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 (London, Winchester, Sydney, Wellington: Pandora Press, 1989) x.

从他(她)们栩栩如生的描写中,我们中国读者了解到无论是中国的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的史料或逸事。在某种程度上,他(她)们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使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一看我们的历史,这对我们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不无裨益。

这套文化游记丛书包括两卷本法国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英国弗雷德·亨利·巴尔福的《远东漫游》、美国萨拉·康格的《中国来信》和英国彼得·弗莱明的《独行中国》。这几部作品从不同层面揭示了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早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继英国人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在1811~1812年旅行西藏之后,最早报道西藏情况并引起轰动效应的西方人首推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1839年,古伯察到澳门传教,先后寓居华南、北京、内蒙等地。1844年,他和比他年长五岁的秦神父(Joseph Gabet, 1808~1853)从多伦多出发,穿越戈壁荒漠,于1846年1月到达拉萨,受到藏民的欢迎。但只住了两个月,便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他的两卷本《鞑靼西藏旅行记》(*Recollections of a Journey through Tartary and Tibet*, 1850)<sup>①</sup>记录了他的这次旅行见闻,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不久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俄文等多种文字。他后来把他和秦神父被从西藏押送至成都后,却受到四川总督保兴的善待以及随后的旅行经历写成了两卷本《中华帝国纪行》(*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1854)。《中华帝国纪行》的可读性更强,英文译者在介绍古伯察及该书特点的译序中说:

---

①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载,该书首版为1850年,但根据译者耿昇考证,该书首版为1851年。——笔者

这两卷书的作者由于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而闻名于英语读书界,但《中华帝国纪行》是比《鞑靼西藏旅行记》更有趣、更重要的一部作品。古伯察熟悉中国的机会比以前的任何欧洲人多得多。这次游记记录了穿越中华帝国的整个心脏地区,从西藏边界到广东。在旅行期间,他一路上享受政府高级官员的荣耀,被清政府官员们恭候,有卫队护送,经常同国家最高官衔的官员保持接触。在此之前长住并走遍中国各地长达近 14 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与各阶层亲密接触,但接触更多的是穷人,在执行他的使命时,他努力不事声张,秘密行动,细看民间生活,观察那个仍然不为外人知晓的中华帝国神秘社会的隐蔽机制的运作,虽然它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占全人类 1/3。他对中国人的机构、宗教、举止和习俗的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而是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的。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给他的读者时,不是以干巴巴的正规理论方式,而是更加轻松愉快地传达他非凡旅行中各种各样的见闻。也许不应该抱怨,因为这是一次在不对外披露的情况下的旅行,陈述的一些事情,居然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发生,足以让人感到惊异。然而,古伯察众所周知的高雅性格(这部作品在幸运的情况下发表)和富有准确性的内部证据(陈述的每一处地方)能够(对真实性)提供充分的保证,甚至对独一无二的、最意料不到的事情的真实性也能提供充分的保证。

精通汉文、蒙文和满文的古伯察对 19 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洞察之细之深令我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他虽然是来华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但对清朝的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人情等俗世考察的兴趣常常胜过他对天主教的传播。如果说当时来华的欧洲人甚至美国人都怀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情绪,那么古伯察却力求客观地报道他对中华帝国的观感。他有意识地克服西方人看待中国社会时或赞颂或贬低的两种主观倾向。为此,他说:

我们首次对中国的概念是 13 世纪由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带到欧洲的。从 13 世纪到目前为止,各方面似乎都一致认为中国人



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像其他的各个民族一样。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我们很少发现在描写有关中国人的资料中,除了矛盾百出外,没有任何符合事实的东西。一些人痴迷于中国人,其他一些人则总是咒骂和嘲笑中国人。(《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

西方两位文化圣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恰恰分别是这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古伯察因为有深入了解中国的经历,所以在评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才敢说:

伏尔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迷人的中国图画,描绘了它的等级制的礼仪,父权制的政府,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机构,经常对大多数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教育的明智的行政管理。相反的,孟德斯鸠用最黑暗的颜色,把中国人描绘成一个可悲的怯懦的民族,在残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弯腰屈膝,在皇帝意志的驱使下好像是一群肮脏的牛。

《风俗论》和《论法的精神》的两位作者——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笔下的两幅画面面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两者均有夸张,其真相当然在两者之间寻觅。(《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

古伯察进一步辩证地批评说:

在中国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好与坏、恶与善杂处五方,当注意力集中在哪一边时,你既可以有机会讽刺,也可以有机会称赞。在你想见到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之中,如果你从事先认定的意见出发,而且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个意见的话,你就很容易见到这些好或坏、恶或善。伏尔泰梦想着一个国家,它的编年史与《圣经》的传统不一样,这是一个理智的、反宗教的民族,不过,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他以为,他发现中国就是这个模式的国家,而且成功地把中国推荐给欧洲,让欧洲人羡慕它。(《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

古伯察对中国的机构及其政府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后,发现肯定不应

该对其专制政治大加痛骂,也不应当对其古风 and 父权制的智慧大唱赞歌。他认为,“家庭观念是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大原则。孝道对道德家和哲学家来说是经常论述的主题,一代代皇帝们的谕旨,清朝官员们的讲话,都一直称赞孝道,孝道已成了其他所有美德的根本”。(《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

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涵盖 19 世纪中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突出地揭示了三大要点:

第一,他由于精通中国语言,广泛接触上、中、下层社会,对清朝官场的众生相,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例如满族、蒙古族和藏族)在内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状态观察仔细入微,剖析透彻。例如,他首先发现并赞扬中国农村基层的普选制,认为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没有这么完善的普选制<sup>①</sup>;又如,他通过一个名叫宝囊的官员办案搜刮起诉人的钱财的具体例子,首先发现并提出高薪养廉的问题。<sup>②</sup>

① 古伯察在书中指出:“村子集体负责履行所有财政税收的资金筹集,村子的头领称为乡约,通过普选产生。这种公社式的组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许没有在中国这样完善。这些乡约是被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清朝官员不推荐人选,不对选举施加任何影响。每个村民既是乡约的选举人,又是适合的被选举人;但通常选举一个年龄大的人,根据他的人品和财产而占据村里的这一高位。我们认识许多乡约,能证实他们一般都符合被村民选为乡约的资格。他们任乡约的期限因不同的地方而不同,他们被赋予行使警察的职责,在清朝官员与老百姓之间也起老百姓不能起的传递者作用。”(《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笔者

② 古伯察在书中介绍说:“我们发觉自己宽容地羡慕宝囊极其热心于伸张正义。但他很快给我们亮了底,非常爽快地承认他需要钱。一个处理得好的案件是获取钱的最佳手段。‘如果许可通过从商发财的话,’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通过教训民众、发挥司法原则也致富?’这些不太高尚的情操,所有的清朝官员都有,而且他们公开表示出来,毫无顾忌。司法变成了正常的交易,我们相信,这种弊病的主要原因在政府付给地方法官俸禄不足里可以找到。他们要维持与有轿子坐、有仆人使唤相称的生活极其困难,如果他们没有满足这些开销的钱而只有政府发给他们的微薄俸禄的话。他们的跟班根本没有俸禄,得通过敲诈他们经手的不幸的起诉人而尽可能地得到补偿。起诉人是十足的绵羊,人人从它们身上撕扯尽可能多的羊毛,它们最后被撕扯得皮开肉绽。”(《中华帝国纪行》第三章)——笔者



第二,他站在正义的立场,谴责英国用毒品伤害中国人的恶劣行径,指出吸食鸦片的严重后果。<sup>①</sup>他同时指出腐败的清政府官员不争气,让英国人钻了空子。他说,现在中国每年向英国购买700万英镑的鸦片。漂亮的大海船被武装得好似军舰,用作英国商人的货船,不仅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而且也受到清政府官员的保护。

第三,他对清朝教育制度的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对中国的典籍“四书”“五经”的熟谙和阐释,在西方汉学家中当属佼佼者,即便把他有关《三字经》或“四书”“五经”的知识来考一下今天的一般中国学者,汗颜者肯定不在少数。是他首先向西方人披露,在各国之中,中国在初等教育方面肯定是最普及的国家,在小村落甚至在庄园不会见不到教师。

古伯察虽然遭到清朝官员的误解,在旅行途中吃尽千辛万苦,常冒着生命危险,但依然设身处地看待中国,正如他在前言里说的:

走遍这个国家或有时住在港口城市肯定不总是这个样子,这可能有利于熟悉中国社会。为此,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人的生活认同,你必须在他们中间生活很长时间,而且你自己几乎变成了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在14年间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资格有把握说有关中华帝国的情况,我们把它视为第二祖国,我们来到这里就没有想到回去。在我们的观察中,情况也十分有利于我们,因为我们多次走遍帝国的各个不同的省份,可以把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还能初步了解中国最高统治阶级的礼仪。在我们居住在中国的期间,我们旅行了各地,从边远的西藏到广东。

---

① 古伯察为此说:“在广州、澳门和向欧洲人开放的通商口岸,我们听到有人企图为鸦片贸易辩护,断言鸦片的副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坏,同烧酒和其他的许多东西一起用,大烟才会有伤害。据说,适度抽大烟对虚弱、委顿的中国人有益。不过,说这番话的人通常是大烟贩子,很容易想象,他们所有这些可能的辩护是为了减轻他们受到的良心谴责,这正好说明他们在干坏勾当。但是贸易的精神和渴望赚钱彻底弄瞎了这些人的眼睛。除此之外,他们却很慷慨,他们的钱袋总是开向不幸的人,做每样好事很及时。”(《中华帝国纪行》第一章)——笔者

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使中国各族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外祸内乱、形势日趋严重”<sup>①</sup>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如此热切关注中国社会、热爱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法国传教士,我们还能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吗?

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 1846~1909)的《远东漫游》(*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 1876)中的“漫游”与古伯察躬亲徒步中国的“纪行”有所不同,他所做的更多的是“笔游”。巴尔福于1870年来华经营丝绸和茶叶,后来在华从事新闻和出版事业,先后担任《通闻西报》《华洋通闻》和《字林西报》的主笔,并且担任过1873年创刊、柯泰洋行发行的上海英文报纸《晚报》的主编,熟谙中国的政治和历史。他在《远东漫游》一书中以20章的篇幅,不但介绍19世纪中叶清朝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特别在涉及朝鲜和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上就其所了解的情况而发表的看法颇有见地,而且还谈到中国的宗教以及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地道的文化漫游。作为成就斐然的西方汉学家,他从事道教经典的翻译,翻译了《太上感应篇》《清静经》和《阴符经》等,于1881年在伦敦出版了《南华真经》(即《庄子》)的译本,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的《道教经典》,这为他通晓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精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远东漫游》耐人寻味之处是作者论述清朝的政治与外交时能切中时弊,或者说深中肯綮,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起着警醒作用。

首先,巴尔福对当时清政府腐败现象的揭露入木三分。清政府鉴于1873年几近与日本开战、鸦片战争吃亏后,1875年与英国关系又趋于紧张,国内各地反清运动不断,便着力于军备建设。可是办军务、造枪炮却成了经办官员中饱私囊的财源。巴尔福说:“只要中国政府依赖无知的官员管理所有涉及兵工厂的事物,而不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公

① 引自耿昇的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译本中的“译者的话”。——笔者

之于众,或以任何方式加以约束;只要这些官员怀有私心,丝毫不顾及他们掌管的设施是否能成功运转,而只能对迅速增加自己的私利感兴趣的话,那么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器、弹药,还有战舰就必须不断地从欧洲购进。”(第五章 中国的军备)像这类清朝官员腐败无能而在官场却勾心斗角的种种表现在这本书中有多处生动的描述。

其次,巴尔福对清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误与被动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新闻报纸的主笔和主编,剖析国际形势是他的强项。在谈到琉球王国的地位时,巴尔福认为,清政府向来以老大自居,居高临下地对待“番邦”而又不采取或无力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他们,最后琉球落入虎视眈眈的日本国之手。巴尔福说琉球“这片令人迷醉的土地像童话里漂浮在海中的王国,它是日本人无可争议的财产。但当地人并不喜欢他们的主人,他们想受那个更加强大的帝国的领导,尽管后者对他们的忠心视若无睹。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想吞并琉球,尽管她总是高傲地对这个小国表示善意”。(第六章 琉球王国)巴尔福花了两章的篇幅论述日本对中国的早期侵略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他说“中国像一只猫注视一只老鼠一样地监视着日本,后者每采取一项新的措施都将大大地刺激前者的神经。当然这会带来不错的效果,因为中国政府会在清醒时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紧迫感,不论它是多么的迟疑和不情愿”。(第九章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在中日两国对朝鲜的关系上,巴尔福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在中英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巴尔福和古伯察的立场尽管完全不同,为英国贩卖鸦片到中国的强盗逻辑辩护,为英国同其他列强争夺中国市场出谋划策,<sup>①</sup>但他同时也承认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给中国带

① 例如,巴尔福在谈到琉球群岛时建议英国政府插足,说:“如果英国有意作为买家介入这个市场,那么这个戈耳迪之结或许可以解开。正如前不久《观察家》指出的,我们在东方的地位永远不会稳固,除非我们在太平洋拥有一个岛屿,将其作为第二个马尔他,在那里驻扎军队,并可在短时间内登陆上海。英国人可以在日本人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利用好这片土地,从中获取实际的利益……”(第六章 琉球王国)——笔者

来了伤害。他说：“毋庸置疑，来自国外——即西方的压力，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经常做出盲目和愚蠢的举动，从而使自己受制于缔约国的淫威，选择最不愿意走的道路。做什么不做什么，让步抑或赔款，这些都是别人说了算，所以获利的总是外国人……”（第九章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巴尔福在书的开头批评了西方人由于肤浅地了解中国而产生的保华派与反华派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提出“问题的真正答案只有通过确定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的真实品性才能得到”。应当说，他像其他怀有良知的西方汉学家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情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和中肯的评论。他在书的结尾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良好愿望：

但愿不久的将来，东西方世界在更好地了解 and 观点不断前进的基础之上，相互熟悉、彼此忍耐、彼此钦佩对方，也许能做些有助于建立东西方友谊的事情，难道这一希望太过分吗？是英国人了解和更加关心中国人的时候了。他们应该破除这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官员就像傀儡，主要成就就是不停地点头；也要破除这种观点，即认为中国风景就像一幅印在有柳树图案的盘子上的画。我们深信，两国之间存在的冷漠主要是由于误解而不是由于人们通常的想象造成的。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们自己的经历总的来说是非常顺利的，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发现有哪个民族像汉人的子孙那样，十分淳朴、友好、慷慨、勤劳与善意。

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利益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巴尔福发表更加符合中国人观点的高见吗？他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说了一句大实话：大英帝国在同清政府较量中的经历是“非常顺利的”。言外之意是占了大便宜。不过，《远东漫游》毕竟不是政治书籍，而是一本英国报人在中国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国情的探索。他告诫他的英国同胞只有了解中国人“真实品性”，才能更好地同中国打交道。可惜，在当时开口闭口“我大清”的氛围里，上至皇帝下到臣民之中有多少人了

解自己的民族“品性”呢？又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品性”呢？这就是《远东漫游》给我们的深省之处。

《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 1909)的作者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是巴尔福的同时代人,她关注中国国情不像巴尔福那样全面,但有她的独特之处。1898年,她跟随丈夫——美国驻北京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 1843~1907)到中国,在北京住了七年。作为觐见慈禧太后并和慈禧太后有过密切交往的第一个外交官夫人,她对慈禧太后直接的观察和评价,对揭示慈禧太后政治面貌的另一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慈禧太后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女独裁者,中国历史早有这样的定论。我们都知道她仇视改良派的维新变法,1898年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改良派人士,但她同时又提倡新式教育,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鼓励办洋务。萨拉·康格在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时谈起她参观一所当地学堂,为见到那些聪明的孩子感到高兴,认为这么聪明的孩子将会成为中国的一股力量,不经意地对慈禧太后说:“如果清朝一批最有才华的少年既能接受国外教育,又能接受国内教育,这样不就使他们能理解和应付各种新兴的思想观念吗?”慈禧太后当时立刻首肯,说:“他们是应该送到国外去。”几天之后,美国公使夫人就读到慈禧太后1902年2月1日颁发的懿旨:

我朝外交关系至关重要。现值朝邦维新图强之际,更需广纳贤能。倘留洋之士,致力师夷邦科技之长技,方有望多育人才,稍应我朝人才之急。当前各省生员众多,热心时务,留学海外,师一技之长。然宗室之中,八旗各部尚无先例,其教育开化之务,已然不可缓。责宗人府及八旗各部副都统遴选八旗15~25岁品行纯良、天资聪颖、体格健全子弟,汇名成册,上报军机处,在思上报,待钦差之官复试,选出一定数目,资以生活所需,遣送海外游学,以利师夷长技,广闻博识,为我大

清培养人才,效力朝廷。<sup>①</sup>

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与办洋务紧密相连。慈禧太后在这个时期如果不提倡学习洋务,美国公使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的招待会上就不会碰到很多讲英语的清朝官员。他说,他“从未参加过这么多中国官员都讲英语的聚会。在中国南方,讲英语的人比在中国北方多”。<sup>②</sup>美国公使夫人在1904年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沿长江和大运河到南方各省参观访问,发觉“中国创办的男子学校、女子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神奇地冒了出来,这些学校很大程度上采用西式教育方法”。<sup>③</sup>她也亲眼看到了中国当时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对慈禧太后扼杀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变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她主要消灭威胁她政治生涯的敌手?《中国来信》的作者从她的视角,对这一看法显然提供了佐证。

作为八国联军进京镇压义和团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萨拉·康格自然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谴责义和团的“野蛮行为”,赞赏清朝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但在她的日记中,我们对这次清朝政府起初鼓动义和团反帝国主义,后来转过来又和帝国主义一道残杀义和团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来信》是萨拉·康格写给家人看的信集,有时间,有地点,所描述的见闻具体而生动,但不会有小说家的虚构,尽管难免个人的偏见。总的来说,萨拉·康格比较同情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例如她在1900年12月12日写给她的侄儿的信中说:

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了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

① 见萨拉·康格《中国来信》中1903年6月20日“致女儿劳拉”的一封信。——笔者

② 见萨拉·康格《中国来信》中1905年4月17日“致爱女”的一封信。——笔者

③ 见萨拉·康格《中国来信》中1905年4月28日“致妹妹”的一封信。——笔者

的齿轮。尽管我们承认中国的状况已经由于这些人侵而得以改善,但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擅自闯进这片土地?外国人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产物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总是遭到强烈抵抗。

因此,这位美国公使夫人特别关注日俄在中国的争夺,对日军的横行霸道尤为反感。

如果说在中国住了七年之久的萨拉·康格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作了相当详细的历史记录,那么1933年在中国旅行只有七个月的英国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 1907~1971)则凭记者的敏感,在他的游记《独行中国》里勾勒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军事、战争的形势,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我敢说,在有关远东局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可以使我那半生不熟的结论听起来令人心悦诚服”。彼得·弗莱明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比较方便地从北到南跨越整个中国当时不同的政治区域,并采访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国民党区域里的前外交部长罗文干、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头面人物。

年轻气盛、充满冒险精神的彼得·弗莱明,还大胆地跟随伪满洲国的日军行军山路,冒着被伏击的危险,去抓所谓的“土匪”;他还深入到反共前线的作战区,了解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况;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下,他也清楚地了解到蒋介石与张学良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的矛盾,例如,他写道:“当时,前线流传的谣言说,蒋介石和少帅发生了争执,有意要将他的军队夹在日本人和他从华南调来的精锐国军之间,牺牲他的官兵。这是无数流言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们是否真实,丝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这些流言让人听了完全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士兵们葬送了赢得全世界同情的天赐良机。日本人毫不费力就攻下了长城。然后,从南京调来的



几个军团为已经失败的事业进行了英勇奋战,但为时已晚。”(《独行中国》第二部分 第九章 三百万人严阵以待)弗莱明说,他的这本书中的一些素材已在《泰晤士报》《旁观者》和《生活和信札》中登载过,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的报道在当时的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然,这不是一本理论性强的国际政治著作,而是一个年方 26 岁、血气方刚的记者的游记。作者对他北从哈尔滨南至广州沿途的山川风景、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好奇心,把它们一一定格在他的速写或素描里。例如,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烙有中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典型印记的画面:

我们的房间可以通到客栈的石头屋顶上,我沐浴在无垠的月光下。白色的小碉堡伫立在迷人的雾气中,雾气低垂在河面上,笼罩着碉堡,仿佛它们是银制的。虽然当地的酒很好喝,可是饭菜却是这次旅途中最差的一顿。真的很差,我甚至咀嚼了半分钟才知道我用筷子在昏暗的灯光中夹起的一小块东西是鸡的左爪子。当我们向店主——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抱怨时,她操起板凳往她的厨子的头上打过去。那盘菜被送回了厨房。但是,当那菜重新送上来时,我们发现菜里混进了鸡嘴。看到这个,我们放弃了当天的晚餐。(《独行中国》第二部分 第 16 章 可爱的河流)

碉堡是当时战争频仍的中国的一大特色,而当时旅途中条件很差的小客栈的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些不尽如人意的情景却在作者的笔下充满了诗情画意。单凭这一连串情景交融的画面,完全可以拍摄一部关于 30 年代中国的旅游片。

这套丛书可以被视为西方人开讲的中国近现代史话,我们从中听到鸦片战争炮火的隆隆声,八国联军攻击北京的呐喊声,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轻言细语的谈话声,法国传教士长途跋涉塞外崇山峻岭时遇到的寒风怒号声,越过冰川时的滑冰声,私塾里学生背诵《三字

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典著作的朗朗声；看到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壮丽山河，驿站与驿站之间纵马扬鞭的信使，成都整齐漂亮的房屋和街道、豪华气派的衙门，使外国传教士大加赞赏的高度物质文明；了解到有关慈禧太后及其王公大臣的趣闻逸事，清朝官场交往的繁文缛节，清朝官员的外表及其心理状态，包括满族、蒙族、藏族和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等等。总而言之，这套丛书是一面镜子，折射着中国的过去——我们为她古老灿烂的文明而深感荣耀的过去，为她遭受外国列强蹂躏而痛感羞辱的过去，无数经验与教训不能忘怀的、而同现在的联系却无法割断的过去。

2006年2月10日